

京口书史

徐苏 著



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 编

京口书史

徐苏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NGSU UNIVERSITY PRESS
镇江

名城
镇江

文
史

研究
丛书

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口书史 / 徐苏著; 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编.
—镇江: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6. 1
(名城镇江文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5684-0162-3

I. ①京… II. ①徐… ②镇… III. ①图书史—镇江市 IV. ①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17855 号

京口书史

Jingkou Shushi

著 者/徐 苏

责任编辑/顾正彤 马一萍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 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网 址/http://press. ujs. edu. cn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890 mm × 1 240 mm 1/32

印 张/10

字 数/27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84-0162-3

定 价/5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丛书总序

镇江这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在 3000 多年的发展进程中,积累、传承了丰富璀璨的文化成果,是我们进行文化创新的宝贵资源。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望、传承与发展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

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多年来致力于弘扬优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镇江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在出版《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镇江研究丛书》和《镇江历史文化大辞典》等图书之后,现在又以新的视角,由面到点,对镇江的历史文脉进行深度探寻,编撰了《名城镇江文史研究丛书》。

这套丛书共分八册。其中,《三国名城镇江》是展示镇江深厚多彩的三国文化的专著;《江河交汇润州城——北宋文人荟萃录》梳理并揭示了北宋润州朱方门一带的精深文化内涵;《晚清循吏王仁堪文献评注》侧重反映曾任镇江知府的王仁堪忧国忧民、公正廉明、造福百姓的道德追求;《京口书史》对历代镇江人著书、藏书、刻书的文化现象析疑探微;《镇江方言别解》对收集的 400 条镇江方言做了生动有趣的解读;《外国人笔下的镇江》译介了宋元以来英、法、俄、意、日、韩等国人士对镇江多角度的观察和记述;《城市山林》系统挖掘了镇江中心城区 20 多座山体的文化底蕴;《京口耆旧传校证》旨在使藏于书库的宋代重要文献“活起来”。这套丛书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充分展示了镇江地域文化的特色和魅力,有助于人们从中汲取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增强热爱名城、有效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的意识,从而达到以史为鉴、传承弘扬、发展创新的目的。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我们将根据时代的新要求、新进展,不断增强文化自信,继续挖掘、拓展、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扩大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并力促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镇江的文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丛书历经三年多的编撰、审核、修改,充分发挥了团队优势,凝聚了作者的心血和集体的智慧,显示了大家认真、严谨的学风及对名城研究负责的精神。在这一辛勤耕耘、披沙拣金的过程中,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我们期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名城镇江文史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5 年 12 月

前言

书是人类文明最主要的承载者,也是城市发展进程的忠实记录者。可以说,城市的发展变迁记录在各种不同载体的书中,这既包括甲骨、青铜器、简牍、岩石等不同时期的文字载体,也包括纸张出现后诞生的各种装订成册的抄本、刻本,以及其他的特殊印本等人们印象中的书籍。城市的“人文荟萃”取决于当地历史典籍的厚重。镇江能够成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也因为她是—一个充满书韵的城市。这个城市数千年来著书、藏书、刻书的丰厚成果,不仅丰富了她的文化内涵,而且为她增添了城市魅力。

镇江是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吴国的建立,人们通常认为是从“泰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开始的。包括《史记》在内的文献也是如此记载的。一般说来,吴文化的内涵也是从商朝末年泰伯、仲雍奔吴后开始的。至于泰伯和仲雍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奔吴,司马迁在《史记》中解释说他们是为了遵从周太王的旨意,把继承权让给弟弟季历,然后季历再传位给儿子昌。泰伯和仲雍为了避免纷争,放弃了王位,率领族人去了几千里以外的荆蛮之地。在那里,他们和当地人一样断发文身、刀耕火种,并与之融为一体。他们还将先进的中原文化带到江南,在与当地人融合的过程中,主动接受当地文化的影响;又“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用和风细雨的方式推进改革,实现了中原文化和当地文化的相融,逐步形成了吴文化。这无疑使江南地区由原始社会后期提前进入封建社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可以说,先进的中原文化和江南的当地文化在这块土地上交融互补,促进了社会的文明,推动了城市的发展,而两种文化的碰撞过程,正是由各种不同形式的书记录的。

就拿最早的甲骨之“书”来说,虽然没有甲骨在镇江出土的记录,但这座城市的学者对甲骨文的研究却闻名全国。他们不仅读懂了深奥的甲骨文字,还撰写出一批研究甲骨文字的书籍,这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其中以刘鹗最为著名。光绪二十九年(1903),刘鹗从自己的收藏中精选出有代表性的甲骨 1052 片,整理后拓印,汇编成册,以刘氏“抱残守缺斋”的名义出版,取名《铁云藏龟》。《铁云藏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研究甲骨文字的专著,开甲骨研究之先声,功不可没。刘鹗还给好友罗振玉介绍了自己收藏的甲骨片,罗振玉经过潜心研究,以刘鹗收藏的甲骨为基础,又编成了《铁云藏龟之余》。后人又辑成《铁云藏龟拾遗》《铁云藏龟零拾》《铁云藏龟新编》等,一时研究甲骨文字在中国成为一种时尚。叶玉森的甲骨之“书”也很有分量,他与罗振玉、王国维并称为民国时期研究甲骨文字的三大家。他擅长甲骨文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编著了不少研究甲骨文的书籍,例如《铁云藏龟拾遗考释》《殷契钩沉》《说契》《研契枝谭》等,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学者柳诒徵称他“精摩殷契,所著释例,远轶时贤”。鲍鼎也是国内知名的甲骨文专家。他是一个多才的人,在编辑、注释甲骨和金文辨识方面取得过显著的成绩。他发现刘鹗的《铁云藏龟》一书没有释文,不利于普通人阅读后,就花费了几年的光阴,对书中的甲骨片进行考证注释,编成了《铁云藏龟释文》。

“惟殷先人,有典有册。”不仅甲骨是册,西周的青铜器也是册。青铜器在书籍发展史上的意义就在于其上所雕刻的铭文,西周出土的青铜器上的文字很多且很长,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这些青铜器上的文字,原本只是用来预备稽查的档案性资料,还不具备正规书籍的性质,但它们和甲骨上的文字一样,同是中国书籍的初期形式之一。1954 年 6 月,镇江丹徒县(今丹徒区)大港烟墩山一带出土了“宜侯矢簋”等一大批西周时代的青铜器等重要文物,这批青铜之“书”的出现,将镇江的城市发展史提升到 3000 多年前,让我们看到了书的历史功能。“宜侯矢簋”上的铭文多达 120 余

字,记载了西周分封制的事实和过程,并记述了西周王室开发江南(宜)的真实情况。文物出土以后,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揭开了新中国成立后学界研究吴文化的序幕。镇江籍文史学者陈邦怀首先释读,考定其为周康王时期的文物。文史学者唐兰指出簠铭中的“虞”就是“吴”,作器者乃是吴君,这为早期吴史研究提供了证据。后来郭沫若、陈梦家、岑仲勉、谭戒甫等一批著名学者又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的观点都佐证了镇江是吴文化的源头之一。

简牍的出现,是中国书籍发展史上的一大飞跃。简,是竹片;牍,是木片,编连在一起,称“册”。长篇文字内容成为一个单位的,叫作“篇”。一“篇”可能含有数“册”。现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简是战国初期的。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知,简牍文献流行于先秦,两汉时期最盛,直到东晋末年才被纸张所取代,它作为主要的文献形式在中国使用的时间长达千余年。春秋战国时期简册之“书”的出现,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书香文化的作用,知晓了镇江这座城市最早出现在《春秋左传》简册之上,古地名叫“朱方”。《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前545)中记载:当时齐国左相庆封逃亡到吴国,“吴句余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旧”,这说明当时的朱方已经比较富裕。同时,《左传》中记载的围绕朱方而展开的拉锯战,也证明了早在战国时期,镇江就已经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纸张的发明,对汉唐社会的文化、教育、思想观念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最明显的标志是抄本替代了简牍。抄本的流传极大地鼓励了广大寒士读书的热情。晋代葛洪在其科技名著《抱朴子》的“自叙”中有一段文字引人注目:“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荡尽。农隙之暇,无所读,乃负笈徒步行借。又卒于一家,少得全部之书,益破功,日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艺文。常乏纸,每所写,反覆有字,人鲜能读也。”^①葛洪凭借着持之以恒的读书热情和抄书本领,成为中国科技史上

^① 葛洪:《抱朴子》,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200页。

的著名人物和知名的藏书家。

镇江抄本之“书”对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它记录了六朝时期镇江高度繁荣的社会状况,展示了这座江南城邑的“早熟”风采。可以说,是书香文化和移民文化的无缝对接,让镇江进入了一个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镇江是江南有名的侨民城邑,对大规模的北方移民来说,这个城市的包容力是令人敬佩的。六朝时期,因受战乱影响,北方人民纷纷被迫迁徙,以躲避战乱。这次迁徙持续的时间长、规模大、范围广,并形成了三大支流:一部分迁居于今陕西、甘肃、山西,当时被称为“秦雍流人”;一部分迁居于今河南、河北,被称为“司豫流人”;一部分迁居于今山东、江苏、安徽,被称为“青徐流人”。到了永嘉元年(307),京口成为江南最大的侨民集中地,侨寓人口超过了22万,几乎占到移民江南人口的九成,来自北方的移民及其后裔逐渐成为京口城的主体。据谭其骧统计,《南史》列传中收录了728人,隶籍北方者506人,原籍南方者仅222人。京口接收的移民最杂、最多,但汇聚的杰出人才也最多、最精。刘裕家在京口,萧道成、萧衍家在武进南兰陵(历史上,武进辖域变化较大,大体先西北后东南,此处之武进及南兰陵,系指先期西晋从丹徒、曲阿分出之地,位于今丹阳境内),皆属镇江。萧子显评价镇江时说:“宋氏以来,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这样的解读还是有点道理的。那时,侨居京口的人才算得上来自五湖四海。

永嘉南渡的北方人民,有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很高的文化素养。他们与勤劳的江南人民和睦相处、优势互补,共同推动当地的社会发展。生产技术与文化的交融互动扩大了当时京口地区的开发范围,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改良了京口地区的耕种技术,农业生产由粗耕转变为精耕,发展了生产。移民的到来,也改变了京口原有的社会结构。随着开发层次的深入,到南朝刘宋时期,在吴文化的推动下,京口在东吴时期建起的军事城堡的基础上有了划时代的发展:政治地位显要、经济实力雄厚、文化事业兴盛。《宋书·文帝纪》载:京口“襟带江山,表里华甸,经涂四达,利尽淮海,城

邑高明，土风淳壹，苞总形势，实维名都”。京口又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形势和四通八达的水运交通发展迅速，六朝时期成为东南重要的商业都会和经济中心，这座城市进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

抄本之“书”的出现和传播，也激发了镇江人读书、著书和藏书的热情，催生了许多精品力作问世。得益于抄本的传播，京口出生的刘勰及时阅读了同时代人的作品，并能进行当世的交流与评论，这极大地鼓舞了他的创作热情，促成了《文心雕龙》的诞生，进而推动了以他和钟嵘为代表的文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和徐陵的《玉台新咏》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扛鼎之作。梁武帝的第七个儿子萧绎，爱好书籍，聚书八万卷，是抄本时代藏书最多的人。萧绎聚书的主要方式就是去各处抄写，这也说明了作为齐梁故里的镇江当时抄本传播的兴盛。而苦孩子出身的王僧孺，虽然早年丧父，不得不“佣书以养母”（《南史·本传》），但他排除窘迫生活的困扰，边抄书、边诵习，久而久之，便博览了三坟五典、五经六艺，又读了许多杂家著作，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而且他还凭借抄书，藏书一万余卷，其中有不少书是从很少流传的异本转抄得来的，因而显得尤其珍贵。王僧孺与沈约、任昉同为当时最有名的三大藏书家。即使到了后来雕版印刷盛行的清代，抄本仍有其存世的价值，继续发挥着传递知识的作用。叶廷琯在《鸥陂渔话》中说：“震泽俞子骏……抄得邑中明孝廉《葛苍公集》，余曾借读，集共二十四卷，是其子孙所哀录，藏于家，未经刊刻，诗文有奇气而不免粗广，编次亦无体例。”（光绪丹阳县志卷三十五引）这说明了抄本仍是当时文人获取文献的一种有效手段。

石刻之“书”的出现，展现了镇江书香文化的别样风情。闻名于世的焦山摩崖石刻，分布在焦山西麓沿江口一带，陡崖峭壁、连绵起伏，在浮玉岩、观音岩、雷轰岩、巨公岩、瘞鹤岩到栈道岩的近百米岩石上，留下了从六朝到民国时期诸多名流雅士、骚人墨客的题记和题刻。这些题记和题刻约百方，字体有正、草、隶、篆等，篇幅形制也长短不一，少的几字题跋，多的百字铭文。在摩崖石刻

中,最醒目的当属浮玉岩上宋代书画家赵梦奎的“浮玉”两个大字,苍劲秀丽。著名的书家有宋代的米芾、吴琚、陆游等,明代的黄淮、徐有贞、谢琛等,清代的陶澍、梁章钜、彭玉麟、洪亮吉、陆润庠等,近代的康有为、李根元等。至今保存最完好的石刻要算陆游与友人踏雪寻访《瘞鹤铭》时留下的散文石刻:“陆务观、何得器、张玉仲、韩无咎,隆兴甲申闰月九日,踏雪观瘞鹤铭,置酒上方,烽火未息,望风樯战舰在烟霭间,慨然尽醉,簿晚泛舟,自甘露寺以归。明年二月壬辰,圜禅师刻之石。”陆游存世的书法作品极少,所写的散文石刻能够保存下来当真不易。

摩崖石刻中最珍贵的是《瘞鹤铭》。唐代以前,《瘞鹤铭》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唐人著作中只有孙处元的《润州图经》中提到过它,但宋代以后,它开始受到学者和书法家的推崇。最早注意《瘞鹤铭》的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后来是宋代书画家黄庭坚。黄庭坚在为苏东坡的书法高论“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作注时称:“结密而无间,惟瘞鹤铭足以当之”,“瘞鹤铭者,大字之祖也”。随着时间的推移,《瘞鹤铭》那笔势开张、点书飞动、天然错落、潇洒纵横和同兼篆、隶、草三体书法之长的特点越来越引起世人的重视,被誉为“碑中之王”,在书法界的地位越来越高。后来,清代大臣阮元创建焦山书藏的时候,还将《瘞鹤铭》中文字的顺序作为藏书的排架号。

除了摩崖石刻,焦山中还有石刻之“书”——焦山碑林。焦山碑林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占地 7000 平方米,共陈列着六朝至唐、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碑刻 400 余方。焦山碑林中著名的碑刻有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开皇本兰亭》石刻,唐代颜真卿的《题多宝塔》五言诗刻 44 方和被誉为“初唐妙品”的佛门之物《魏法师碑》,宋代苏东坡的题词石刻、黄庭坚的“蓄狸说”石刻、米芾临《兰亭楔帖》和《禹迹图》的碑刻,元代赵子昂书的《赤壁赋》石刻,明代杨继盛的《题焦山》石刻,清代成亲王的《归去来辞》和《澄鉴堂法帖》石刻等。

摩崖石刻和焦山碑林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又纪实入微、一事一叙。有的记载佛经、佛事,如梁代的《陀罗尼经幢》和元代赵子昂的《甘露寺水陆堂记碑》;有的记载史书、史事,如唐代韩晋公《春秋通例》的石刻和明代辛丰镇《巡兵官役不得擅取民夫记碑》;有的劝政廉,如唐代岑植撰的《德政碑》;有的劝农耕,如宋代冯多福撰的《劝农》诗刻;有的讲城建和水利,如宋代史弥坚的《重修土城记碑》和《重浚归水澳记碑》;有的讲学校和藏书,如宋代汪藻的《重修府学碑》和清代阮元的《焦山书藏记碑》;有的为名山增色,如宋代苏东坡在五州山上所题的“卧看沧江”石刻;有的使名刹生辉,如梁代晋安王萧纲撰的《招隐刹铭》……碑文石刻中更多的是诗文和游记,如唐代李德裕在招隐寺所题的《玉蕊花》诗石刻、宋代米芾的《甘露寺》诗石刻和陆游的《多景楼记》石刻等,涉及的名家众多,分布甚广。

清代诗人谈安凯在《读甘露寺碑记》里讲述了北固山长廊所蕴含的文化现象。他说:“山寺残碑卧曲廊,我来拂拭认前唐。历观古寺苔文瘦,行到高峰松影凉。六代风流随逝水,千年陈迹胜斜阳。只余宝晋书声满,尚间疏钟彻上方。”根据《北固山志》的记载,长廊在甘露寺天王殿后,直行向后峰的东部顶端延伸,随山侧上计21间。西后墙嵌碑,前短墙作栏,后峰治地分三层各通行路。长廊的每一间均有各自不同的作品,充分展示了石刻之“书”的文化内涵。其中,第4间、第5间分别是镇江郡守、镇海将军撰写并刻石的重修内外城和府城墙的记文;第7间、第8间、第13间、第15间、第16间、第17间分别是宦游官员和外地诗人的诗作石刻;第9间、第11间、第12间、第19间镶嵌着“甘露流芳”“天下第一江山”“与物造游”“宏开鹭岭”字样的石碑;第10间则是文人撰写的考证跋文石刻。

鹤林寺的古墨林石刻之“书”的文化内涵也很丰富。那里除了最著名的米芾的“城市山林”碑刻外,还有许多名人的石刻诗文,这些都是名城镇江的珍贵文献。历史上鹤林寺中的碑刻很多,

寺里的僧人为了妥善保管这些碑刻,曾把它们集中起来砌在壁间,称之为“古墨林”,遂成为鹤林寺的一大景观。在古墨林中,名人之作甚多,有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游招隐寺及鹤林寺的诗、岳珂题的古竹院僧房的诗、米友仁为其父米芾自画护法小像写的像赞文字、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写的马素禅师《简族弟》诗、刘光祖写的《书呈鹤林宗山长老》文及镇江府的《濂溪先生书堂记》等。古墨林中,佛经文字也不少,有宋高宗书写的《佛经》七通、鹤林僧人如瑶书写的观音碑文及《金刚经》的碑文等。古墨林中还有一块碑值得注意,那就是唐代文人李华撰写的鹤林开山祖师马素的塔铭。

雕版之“书”的出现,使人们对书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尤其是刻书雕印留下的那种墨香,使人们感受到一种纯净的书香味道,那往往是读书人津津乐道、为之痴迷的。我们所说的雕版,是用雕刻方法制成的一种印刷版,或指用雕刻方法制作印刷版的工作。雕版印刷术,是在中国的文化背景、社会需求、技术基础、物质条件相互配合之下,印刷技术长时期演进的产物。中国最早采用雕版印刷术来印制书籍,大约在唐朝初期。到了宋代,雕版印刷进入了鼎盛期。从雕版印刷的推广程度可以看出,凡是刻书业兴盛的地方,都是文化发达的地方。江浙地区才俊集中、人文荟萃,文化的强盛推动了当地雕版刻书业的发展。镇江处在金陵和姑苏两大刻书中心之间,民众刻书的积极性不言而喻。元丰八年(1085),苏东坡和金山寺的佛印大和尚就在镇江金山寺主持刊刻了《金山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开创了镇江寺庙藏经的先例。到了明代,不仅金山寺的藏经楼中藏满了大藏经卷,甘露寺和定慧寺的藏经楼中也都珍藏了大藏经卷。而宋代镇江的官府刻书,尤其是府学刻书,不仅数量可观、质量上乘,在刻书史上有一定影响,而且对镇江元、明、清历朝的雕版刻书有明显的影响。同时,刻书也大大提升了镇江文人著书立说和藏书传世的积极性,促使各种名著的出现和私人藏书家的产生,例如沈括的《梦溪笔谈》和苏颂的私人藏书在全国都是有名的。

目 录

著述篇 001

韦昭和《国语解》 004

葛洪和《抱朴子》 007

徐邈兄弟的著作 012

刘氏皇族的著书 014

何承天、何逊及他们的著作 017

刘义庆和《世说新语》 019

鲍照和《鲍参军集》 024

陶弘景和他的著作 027

刘孝标和《世说新语注》 031

萧氏皇族的著书 034

刘勰和《文心雕龙》 039

萧统和《文选》 043

徐陵和《玉台新咏》 046

道宣和他的佛学著作 049

殷璠和他的诗歌选集 051

储光羲和他的诗集 056

皇甫冉兄弟以及他们的著作 058

张祜和他的诗歌著作 060

许浑和《丁卯集》 062

吴淑和《事类赋注》 066

王存和《元丰九域志》 068

- 沈括和《梦溪笔谈》 070
- 米芾和他的书画著作 074
- 葛胜仲和他的著作 077
- 洪兴祖和《楚辞补注》 078
- 郭畀和他的《云山日记》 082
- 余德邻和他的家族著书 085
- 丁元吉和他的家族著书 087
- 计成和《园冶》 089
- 笪重光和他的著作 091
- 鲍皋及其家族的诗歌著作 094
- 张玉书和他的家族著书 097
- 王文治和《梦楼诗集》 101
- 清代镇江经学家及他们的著作 104
- 赵彦偁和《三愿堂日记》 107
- 李承霖和他的家族著书 111
- 清代丁氏家族四翰林及其著作 114
- 陈廷焯和《白雨斋词话》 116
- 刘鹗和他的著作 119
- 马建忠和他的著作 122
- 赵曾望和他的著作 125
- 姚锡光和他的著作 127
- 柳诒徵和他的著作 130
- 唐邦治和他的著作 133
- 叶玉森和他的著作 135
- 陈邦贤和《中国医学史》 139
- 易君左和他的著作 142
- 吕叔湘和他的著作 145

藏书篇 149

- 南朝宋藏书家刘穆之 152
- 南朝梁藏书家王僧孺 153
- 南朝梁藏书家萧琛 155
- 南朝梁藏书家马枢 156
- 苏颂和他的藏书楼 158
- 叶梦得在镇江的藏书活动 160
- 史正志和他的藏书 162
- 岳珂和他的研山园 165
- 杨一清和他的藏书楼 167
- 明代丹阳的藏书家 170
- 明清时期句容的藏书家 173
- 冷士嵎和他的藏书 174
- 官府藏书楼——文宗阁 176
- 海岳庵焦山书藏 185
- 蒋宗海和他的藏书楼 189
- 清代镇江的其他藏书家 191
- 王豫和他的藏书 192
- 陈庆年和他的传经楼 194
- 袁树珊和他的润德堂藏书楼 198
- 鲍鼎和他的藏书楼 200
- 陶绍莱和他的游经楼 204
- 尹文和他的藏书 207
- 蒋逸雪和他的藏书 208
- 范用和他的藏书 210
- “绍宗”藏书香如故 212

民国省立镇江图书馆 215

刻书篇 225

镇江雕版印刷的缘起 228

宋代的私家刻书 230

宋代镇江的官刻方志 233

宋代镇江的府学刻书 237

现存珍贵的宋代镇江府学刻本 240

镇江宋刻类书和元代刻书 242

明代镇江的官府刻书 248

明代镇江的官刻方志 254

明代的坊刻和私家刻书 259

清代镇江府的刻书 264

丹徒县的官刻书 267

丹阳县的官刻书 270

句容县的官刻书 272

清代镇江的坊刻书 274

清代镇江的私家刻书 277

清代私家刻印的山水志 282

清末民初镇江的雕版印刷及其他 286

参考文献 293

后记 297